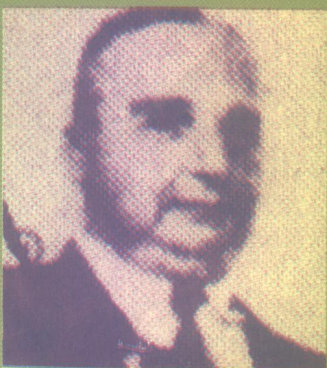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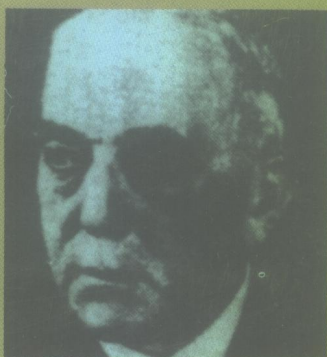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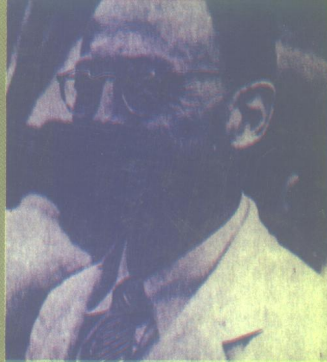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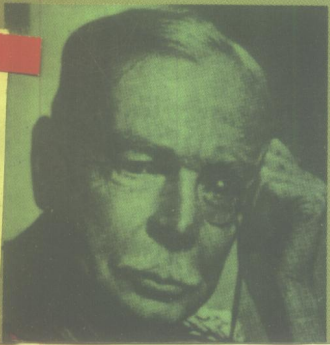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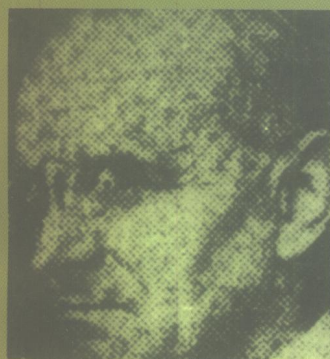


陈济康 戚厚杰



蒋介石的洋顾问



蒋介石的洋顾问

陈济康 戚厚杰 等编

华文出版社

(京) 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陆士华

封面设计：童行侃

版式设计：陆士华

蒋介石的洋顾问

陈济康 戚厚杰 等编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孙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字数214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075—0396—8/K·9 定价：8.50元

前 言

在变幻纷繁的民国舞台上，始终活跃着一批来自苏、德、美、日等国的顾问。他们或受中国政府之聘，或受本国政府的派遣。来华后，他们有的运筹于帷幄，指挥在战场，有的折冲于纠纷和外交，策划于密室。他们几乎参与了民国时期所有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活动。尽管他们人数不多，却对民国社会影响甚大。

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想分开也不可能。”外国顾问来华，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现象。由于派出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因而派出顾问的目的也不一样。20年代社会主义的苏联派出大批顾问来华，帮助中国革命。他们在改组国民党、组建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建立了功勋。苏联顾问是有功于中国革命的，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

从2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初期，来华服务的是德国顾问。德国顾问来华是两国相互需要的结果。国民政府需要德国的建军经验、军事技术进行内战和军政建设；德国需要中国的资源进行扩军备战。德国顾问参加了中国的新军阀混战、“剿共”、整训军队和对日抗战准备等重大活动。

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派出了大批顾问来华，参与中国战区的军事指挥等重大活动。

历史是多元的，也是多彩的。外国顾问来华，不仅仅是他

1

们个人的行动，也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关系。从派出国来说，他们是使者，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派遣顾问来攫取更大更多的权益，从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是“客卿”，通过他们的思想和技术来巩固统治。因此，顾问们在华的行动，不仅受本国政策所左右，还要迎合国民政府的政策和主要领导人的意图及性格，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调离岗位。特别是他们直接服务的蒋介石，擅自妄为，独裁专横，不仅使有功于中国革命的鲍罗廷、加伦遭到通缉，就连东奔西闯的佛采尔也被撤换，服务多年的端纳负气他去，文质彬彬的拉铁摩尔遭冷落，气高骨硬的史迪威被赶走，即便是忠心耿耿的陈纳德最后也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相反，嗜杀成性的梅乐斯反被垂青，血债累累的冈村宁次倒被重用……。史迪威曾对蒋介石有这样的评论：“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会有不少麻烦。‘小人’目光短浅，顽固不化，性情暴躁，他是个无知，容不得人，武断，不可理喻，语无伦次，忘恩负义，贪得无厌的人。”“……蒋介石的统治只会带来贪污腐败、任人唯亲、苛捐杂税、草菅人命和玩弄民权。”史迪威在华多年，在中国战区又与蒋共过事，他的评论一言中的。

民国时期来华外国顾问成千上百，即使是主要顾问也不止本书所列的十几个人。我们的目的只是撷取若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介绍，力图从一个侧面再现纷纭复杂的民国社会，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软弱黑暗，揭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把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方能使中国社会发展、富强，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是随着历史潮流而沉浮的。对于他们的功过是非，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

度，给予公正的评价。但由于外国顾问的题目在民国史的研究中还是空白。也由于所写人物的材料多寡不同，尽管我们在写作中尽量广征博引，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注意采用档案材料，表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仍可能是一个正面，也可能是一个侧面，甚至是一个背影。但只要能有利于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的昨天，增长一点历史知识，也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了。

参加本书撰写、修改、搜集资料等工作的还有丁萍、银梅、李小莉、书文、陆惠英等同志，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责任编辑陆士华同志对书稿精心审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济康 戚厚杰

1994年2月

目 录

中国革命中的传奇式外国人	
——端纳	(1)
大革命中的军事总顾问	
——加伦	(21)
蒋介石的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	
——包尔	(55)
蒋介石的第二任德国军事总顾问	
——佛采尔	(73)
蒋介石的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	
——赛克特	(95)
蒋介石的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	
——法肯豪森	(118)
臭名昭著的“军统”顾问	
——梅乐斯	(140)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拉铁摩尔	(165)
蒋介石的美国参谋长	
——史迪威	(181)
航空委员会顾问、飞虎队长	
——陈纳德	(218)
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	(258)

中国革命中的传奇式外国人

——端纳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震惊莫名，一片混乱。此时，一个外国人来往于南京、西安之间，进行斡旋，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奔忙。他就是蒋介石的顾问——端纳。

威廉·亨利·端纳，澳大利亚人。他在原籍无学历，亦无声望。后来中国，前后达四十多年，奔走于大江南北，结交公卿大夫、军阀权贵和国家元首，被视为上宾，聘为顾问。他是和旧中国政治舞台关系密切的一个传奇式人物。

初到香港

端纳187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里斯峪，其祖先是苏格兰人。其父为建筑包工，家境平平。端纳中学毕业后做排字工人，由于聪明好学，后到报馆做记者，先后去过悉尼和墨尔本。

1902年，端纳经友人介绍到香港，在《中国邮报》任职。初来香港，他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此时，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腐败透顶，日薄西山。革命党为推翻封建统治正积极活动，而香港正是革命活动的前哨阵地。中国犹如一头睡狮，正在觉醒之中。

端纳作为初来香港的记者，苦于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于是便想方设法寻找契机。一次，他为采访新闻来到广州，欲访两广总督张人骏。总督府墙高院深，戒备森严，端纳无法进门，也不愿因此去央请英国领事介入。端纳天天在门前守候，等待机会。总督幕僚张宗克见此情景，起了怜悯之心为他安排晋见。端纳见多识广，在与张人骏见面时，纵谈天下事有条不紊。张人骏乃一封建官僚，孤陋寡闻，经端纳一讲，耳目一新，遂款以香槟酒。端纳不会喝酒，侍从人员劝他佯饮，端纳说他不愿做这样不忠实的事。张人骏听后大喜，当即请端纳作名誉顾问，并准许他随时赴广州晋见。从此，端纳在中国大陆得一门径，更多了一条新闻渠道，奠定了他日后工作的基础。

此时，革命风潮汹涌澎湃，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数度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党人在港、澳积极活动，积聚力量。一次，革命党人雇用日轮运送军火由澳门到广州，在珠江上被清兵查获，撕毁了日本国旗。日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要两广总督向日国旗磕头赔礼，并索要赔款一百二十万两。清廷害怕日本的压力，慈禧太后被迫降旨接受日本所提条件。为此，张人骏询于端纳，端纳立即遍访串联广州七十二个工商团体，十三个慈善机关和总商会，发动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人闻讯大惊，从此不再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

端纳深知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就赴香港革命党总部求见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在国外，胡汉民接见了，对他的热情表示欢迎。这样，端纳与清朝政府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建立了联系。由于他非常活跃地参与中国的政治，因此他的新闻报道更加充实，其名声日见显著。1905年他兼任《纽约捷报》驻香港通讯员和《远东杂志》主笔，曾为该报报道过日俄战争的经过。后又参加《德臣西报》的工作，1906年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兼社长。此

时，他与莫理循在香港相遇。由于两人原籍、语言相同，又对中国的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自此之后便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

在辛亥革命中

端纳在香港八年，名声大振，收入相当丰裕，他本可在香港过舒适悠闲的生活，但他年富力强，冲劲十足，于1911年赴上海。在上海，他认识了查理宋（宋耀如）。宋对西方文化谙熟，和端纳一拍即合，几次促膝晤谈之后，端纳就成为宋家的常客。宋与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革命人物多有来往，经宋介绍，端纳又与伍廷芳、王宠惠、王正廷等人相识，后又结识虞洽卿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上海方面的革命由伍廷芳主持。端纳向伍建议，为争取国际同情，应立即宣布遵守各国与清订立的条约义务，并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伍廷芳采纳其建议，并邀端纳协助办理外交。

端纳为采访辛亥革命前线战况，不顾危险，深入到前方。当时，江苏省民军的前线在镇江，端纳只身来到镇江后，在车站遇见美孚公司经理、美国人安德生，二人一见如故。安德生欲往南京，但交通隔绝，火车不通。二人同去见民军指挥官，问他不通车的原因。指挥官说，镇江、南京间的铁路上埋有炸弹。端纳不信，经指挥官允许，端纳自告奋勇向车站借得火车头一辆，由安德生驾驶，开往南京，抵达城郊时，并未发现炸弹。此时天色已晚，月明星稀，端纳让安德生在火车头上等候，自己爬上紫金山，观察南京的防务。到达山顶后，见太平门边富贵山上有一炮兵阵地，部署大炮五门。端纳回到火车头，与安德生驰回镇江，建议立即进军，攻打南京。

第二天，民军将新到的两门大炮运至南京城外，却无人知道如何发炮。端纳与安德生仔细看了看，摸到一点门道，就让士兵架起大炮，对准太平门。民军决定大炮由端纳指挥，安德生拉线发炮，首先摧毁了富贵山的炮兵阵地。第二天攻城，第一炮发出，竟越城门而过，在北极阁爆炸。安德生赶快调低炮口，连连发炮，均未中的，只见炮弹落在城中，四处泛起烟火。最后终于打中太平门的城楼，击毙守兵多人。由于南京城高墙厚，城墙终未轰开。但城内军人已乱，守将张勋挽请美国副领事出城乞和，张勋于当晚逃走。民军于次日入城，俘获张勋姨太太多人，欲将她们拍卖，端纳建议用她们换取浦口的火车头和车厢、车皮，作为日后北上之用，民军接受了他的建议。至此，南京宣告光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把起草对外宣言的任务交给了端纳。

朋友？内奸？

孙中山在大总统位四十四天，辛亥革命的果实即被袁世凯窃去。袁上任后名为共和，实际上还是封建专制老一套。他为敷衍孙中山，任命其为铁路督办。孙中山考察铁路时，经常带着王宠惠、端纳同行，因为端纳了解英国在印度修建铁路的经验教训，见多识广，孙中山对他非常器重。

由于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和革命党人所主张的议会政治大相径庭，因而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鞭挞，而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则全力支持袁。为了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端纳以孙中山顾问的名义，利用孙对其的信任，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内外结合，开始了攻击、破坏以孙中山为首

的革命党人的活动。

首先，端纳不时地向莫理循透露同盟会内部活动情况。他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说：“这里（指同盟会）正进行着某些活动，我要你在北京想些办法对付。”他告诉莫理循，“他们一开始就找袁世凯麻烦的战术，使任何进展都受到阻挠。”同盟会“把孙中山和黄兴安置在同孚路的一所房子里，每天聚在一起阴谋策划推翻袁世凯”。他还向莫理循透露，孙中山为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而花了四千五百元买《捷报》的消息。他说革命党人“使劲反对外国借款，不过是以此作为打倒袁的政治武器，而他的党徒会使用任何东西，比如利刃和炸弹来达到同一目的。必须把他们阻挡住”。①革命党人反袁斗争的失败，与端纳的告密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次，端纳在革命党人内部向其同伙、澳大利亚的新闻工作者、《上海纪录者报》编辑普拉特提供消息，“通过《上海泰晤士报》进行着一场打倒同盟会的运动”。端纳在给莫理循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为普拉特提供成堆的题材。我叫他对准同盟会的秃脑袋猛烈开火。”“我们索性认认真真地放手去干——至少是我躲在背后，唆使普拉特不停地干下去。由于他和我看法一样，他是乐于去做的。”②在端纳与普拉特的内外勾结下，《上海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文章，极力支持袁世凯。

第三，端纳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和在同盟会中的影响，在同盟会中制造分裂和混乱。当同盟会为了同袁世凯作斗争而准备改组成立一个党时，孙中山、黄兴等到温宗尧家中征求其意见，端纳得知后，便“竭尽全力怂恿他（温）对同盟会敬而远之，让它自行跳火坑得了”。在端纳的挑拨下，“温提出了反对同盟会的论点……”。由于端纳的挑拨和温宗尧的反对，使同盟

会的计谋失败。③

孙中山为了国民革命，对端纳可以说是十分信任的，这一点端纳本人也清清楚楚。他说，孙中山“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们是好朋友”。④但由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影响了端纳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影响了其代理人的统治，因而他对孙中山怀有刻骨的仇恨。他骂孙中山“仅仅是个可怜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低能的庸医”。他对莫理循说：“……你可以劝告袁世凯把所有碍事的捣乱分子统统砍头。袁世凯应该做的是抓起大棒猛击同盟会及其成员的脑瓜。”⑤

端纳对孙中山等革命者的仇恨，对革命党人革命活动的破坏，这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请端纳这样的人做顾问，把内奸作为朋友，他们的斗争怎么能不失败呢？

追随袁世凯

袁世凯上台后，日益专横反动。1913年，袁世凯为镇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向国际财团筹商善后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遭到国内朝野反对。国会不予通过，袁世凯就解散国会，逮捕国民党议员，又刺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于是，孙中山开始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孙中山等逃往日本。当时任参议院副院长的王正廷尚在北京，情况十分危险，端纳将王乔装后护送出京，脱离险境。端纳继续留在北京，任《伦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的记者。他出入于财政总长周自齐之门，并结识顾维钧等要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争漩涡，无暇东顾。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

求袁世凯接受。最初中日双方严守秘密，端纳闻风后四处探询条件内容，不得要领。端纳去问周自齐，周暗示袁的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有英文译本。端纳立即去拜访莫理循。莫理循知其来意，他出于为英国的利益考虑，正不满袁的对日政策，于是敷衍数语后故意离室，将置于桌上的“二十一条”英文译本让端纳任意翻阅抄录。端纳将其发表后引起世界各国注意，国内大哗，民怨鼎沸。⑥日本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于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并进行战争恫吓。外交总长陆征祥手足无措，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陆请端纳代为起稿答复，接受了这一卖国条件。

袁世凯在取得日本和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后，便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端纳深知西方各国的态度。此时《中国新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筹委会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端纳告诉袁，这些报章都是他左右杜撰伪造的，不可相信。袁头脑发昏，根本听不进，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袁世凯抱笏登场，蔡锷在云南首先起义，各省立即响应，兴师讨袁。袁世凯成了过街老鼠，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袁曾令人向英国试探，欲经香港或威海卫英国租界退休，英国没有同意。此时端纳别出心裁，他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欲借美国海军陆战队数名闯入新华宫，将袁绑架送往美国。芮恩施认为端纳的建议近乎荒唐，不予考虑，端纳想导演的这出闹剧没有演成。不久，袁世凯忧郁而死。

在军阀混战中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皖、直、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你争我夺，全国出现割据混战的局面。

端纳住在北京，在“两帅交战，一将倒戈”的混战中，他狡兔

三窟，和任何一方都有来往，特别和上层人物打得火热，端纳将这种情况自诩为“永久的三角形”。此间，他又结识了华北和北京政府的要人，如梁士诒、颜惠庆、施肇基等，与欧美各国驻京使节和中国的文教、工商界人士来往密切，有“中国的莫理循”之称。由于他路子活、关系多，对各派军阀的情况非常熟悉了解，其新闻报道更有权威。他先后被邀担任英《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

1920年，端纳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聘为顾问。同年，受财政总长周自齐委托，主持举办“经济讨论处”。当时的北京政府，忙于内忧外患的应付，无暇顾及财政经济的发展，更不知道财政经济统计调查的重要。周自齐和端纳过从甚密，于是就委任他主持这项工作。

周自齐从北京崇文门关税拨出白银十万两，组织“经济讨论处”。端纳上任后，除负责经济调查外，还创办了中英文经济周刊各一份，该刊为活页式，约七八页，分段搜集摘录国内外有关财经方面的新闻和调查统计，凡对此有兴趣的机关和官民皆可免费收到一份。经济讨论处的开办，实为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调查之滥觞。

1914年冬，孙中山应邀北上到京，共商国事。3月，在孙病危之时，端纳曾到协和医院看望。孙中山逝世后，端纳仍效命北京政府。

1927年春，北伐军攻占上海，端纳到上海采访北伐军的情况，在此，他与蒋介石见面。

协助张学良

1928年，端纳应国民政府聘请，到工商部经济报道局做宣

转工作。同年秋，经罗文干介绍，张学良聘请其到东北，端纳请求辞去在国民政府的工作，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正廷力加挽留，但端纳辞意坚决。当时张作霖刚死不久，东北政权不稳，日本虎视眈眈，端纳担心东北落入日本人手中，自10月底，先后三次书面及口头请辞，年底自上海乘轮船到奉天。

端纳到东北时，张学良已宣布易帜，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端纳初与张学良会面时，见张每隔十五分钟即打一次吗啡，十分惊异。他见张身体瘦弱，脸色不佳，初次见面即对张产生疑心，为一个打吗啡的军人服务是否值得？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有一个自称是杨宇霆、常荫槐的代表的人来访，并面交一张支票给端纳，请他同英国政府商谈一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事宜。来说这一借款是用来发展东三省的种种建设。端纳见来者行为诡秘，顿生戒心，便笑着说，东三省在日本的野心之下，毫无安全可言，杨、常借款搞建设的计划是白费时间。

此人走后，端纳立即把情况告诉张学良，接着又去拜访杨宇霆。他问杨借款一事，杨含糊其词。端纳又乘常荫槐主持的交通委员会的列车到齐齐哈尔访问常，常对端纳所提借款一事紧张惊慌。据此，端纳推测，东北的一场叛乱正在酝酿，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危在旦夕。端纳来到东北，很希望看到东北的稳定，排除日本在该地区的势力，不料事与愿违，他感到很失望。此时，他很想离开东北乃至中国，但冷静一想，作为新闻记者，岂能在危难时退却，应该目睹叛乱的来临，向世界报道。

1929年1月10日，端纳在哈尔滨小游几日返回沈阳，即在旅馆将拜访杨、常二人的事函告张学良。他说，他绝不考虑与杨、常他们合作。信发出不久，他发现张的部属在旅馆内窃窃私语，很是纳闷。翌日六时，他的译员告诉他，罗文干来信，

说杨宇霆、常荫槐已被杀死。端纳望望市面，平静如初，未见军队戒严，他将信将疑，难道这是假的？

端纳来到奉天张学良公署，张将杨、常被杀的真相告诉了端纳。经过张的这次行动和张的几次谈话，端纳对张学良增加了信心，辞职的念头渐渐消退，决心不离开张学良，尽管这时南京多次要他回去。

端纳在东北耳闻目睹日本人的横行。他很清楚，只有张学良才能抵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他对张学良的不良嗜好和虚弱身体深为忧虑，因而决定鼓励并协助张戒除不良嗜好。他每日早晨或同张步行乡间，或打高尔夫球，或在山路骑马，或钓鱼打猎，或游泳，用种种办法引导张产生另外的嗜好。开始效果还比较好，但时间一长，张不能支持，仍要求打吗啡，端纳不免怜悯。他又依医生建议，让张在与世人隔绝的室中呆一个月，张不愿照办。

端纳与张讨论东三省种种建设的计划细目。张为培植政治、技术、科学人材，投资一千万元在沈阳设立了一所东北大学，张学良自任校长。端纳又协助张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进行了改革。端纳对在张身边工作很是满意。

东北的军政建设引起日本人的嫉恨，他们多次向张学良说起老师生前曾与他们讨论铁路建设计划，并要求同张学良继续讨论。端纳每天陪同张参加讨论，他亲耳听到张对日本人声明，毫不知道父亲有这些许诺。端纳对张的态度倍加赞许。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第二、三、四集团军的将领五十余人，联合通电反蒋，为壮大反蒋阵容，将张学良也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5月，大战爆发后，张学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平反蒋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